

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韩子满¹, 刘芳²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描述翻译研究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的概念,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地位,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因此目前在中国大力加强这样的翻译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描述翻译研究也有其不足,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研究者的中立性,一味避免对译本作价值判断,有明显的脱离翻译本身的倾向,而且对译者的创造性重视不够。

关键词:描述翻译研究;成就;不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1-0111-06

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变,由规范转向描述[1],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研究侧重于文本的对照,力图探索语言转换的规律,评判译文的优劣,进而对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而描述性翻译研究则突破了由单纯文本构成的封闭空间,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中研究翻译,考察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关系。其着重点不在于制定规范,做出价值判断,而在于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

就我国而言,规范性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历来占据着统治地位。探寻中外互译的规律,制定普遍适用的翻译标准,一直是学者及译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事实证明,这样的研究过于狭隘,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给我国的译学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此,一些学者认识到开展描述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并开始大力提倡该研究范式[2][3][4]。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学者对描述翻译研究的介绍还不够全面,无法令人窥其全貌。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提及该研究范式的不足。因此,介绍描述翻译研究的来龙去脉,并分析其成就与不足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描述翻译研究的发展

描述翻译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具体来说,这一新的翻译研究范式到目前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最早是发端期。1953年,麦克法兰(J. McFarlane)在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发表题为 *Modes of Translation* 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翻译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因为没法确定“绝对准确”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因此,没有必要要求翻译在各方面与原文对等,而应该接受翻译的实际状况并洞察其本质。在此论述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议采用一种“诊断式而非劝告性”的新的研究方法[5](17页)。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描述翻译研究方

收稿日期:2003-05-23

作者简介:韩子满(1973—),男,安徽长丰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与现代翻译理论;
刘芳(1979—),女,山东乐陵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法的先声。

接下来是准备期。到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研究者,如列维(J. Levy)、米科(F. Miko)和波波维奇(A. Popovic),响应麦克法兰的号召,共同努力探寻新的方法使翻译研究系统化。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构架与后来多元系统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列维曾打算从三方面来进行研究:译者作为历史的、社会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翻译所表达的各个民族传统的或是各个文学时期的不同诗学;由于某些规范及人们对翻译的态度所导致的翻译方法[5](21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应当将翻译放在其产生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

接着是形成与壮大时期。描述翻译研究阵营的正式形成与壮大是在七八十年代。1972年,霍尔姆斯(J. 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一文,正式提出描述翻译研究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构想的翻译学框架中的纯翻译学分支之下。但是,对描述翻译研究阵营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是三次小型会议及会议所编论文集。第一次会议于1976年在卢汶举行,会议论文集为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1978)。第二次会议于1978年在特拉维夫举行,论文构成 *Poetics Today* 1981年第2卷第4期专刊。第三次会议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论文都发表在符号学杂志 *Dispositio* 1982年第7期上。这些论文集与该学派早期的许多其他重要著作,如埃文-佐哈尔(I. Even-Zohar)的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1979)和图里(G. Toury)的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80)在当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1980年代开始,描述翻译研究的阵营不断壮大,他们在翻译界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巴斯奈特(S. Bassnett)于1980年主编的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已然显露了这个新研究范式的痕迹;赫尔曼斯(T. Hermans)1985年主编的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使更多的人读到了从事描述翻译研究的主要人物的论述;而斯内尔-霍恩比(M. Snell-Hornby)的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一书更是将其视为翻译研究的一支主要力量。描述翻译研究者扩大影响的其他手段还有:朗贝尔(J. Lambert)

和图里于1989年创办的 *Target* 杂志(登载大量有关描述翻译研究的文章),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三年一次的会议中举办的翻译研讨班,以及一系列的翻译研究暑期培训班等。

1990年代,描述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0年,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A. Lefevere)主编了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书,在序言中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主张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目的语的文化、政治背景与翻译的互动作用。勒菲弗尔的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即自觉地实践了这种研究方法。这个时期,该研究范式前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日趋沉默,如埃文-佐哈尔的 *Polysystem Studies* 以及图里的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都是对他们早期观点的修订,无论是在理论观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没有太多的新意。与此同时,正如罗宾逊(D. Robinson)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些与主流描述翻译研究相背离的翻译理论流派,尤其是女权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虽然是在早期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已有取而代之之势[6](233页)。但描述翻译研究是否真的被取代,还是将有新的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 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

毫无疑问,描述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我国的译学建设也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具体来说,其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的定义空前扩大,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现象也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在描述翻译研究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与原文全面对等的文本才称得上是翻译,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大多局限于此,这就将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其他翻译行为贬斥到边缘位置。而描述翻译研究者则“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4],声称只要是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的面貌出现或是目的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都可称之为翻译[7](32页)。这样一来,翻译的概念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展,除了以前普遍认同的翻译文本之外,更囊括了为数众多的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甚至包括一些极端的例子如转译(通过一种中介语言进行翻译)和伪译(不存在原作的翻译)。转译和伪译这两种翻译现象在我

国历史上都是存在的。拿转译来说,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清末民初(1840—1920)由日译本转译为汉语的欧美小说就有77种[8](165页)。但我国目前似乎尚无专题论著对此进行描述性的个案研究。不过,“伪译”这一现象已引起我国译界学人的注意。如胡翠娥就指出,我国历史上的伪译“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并着重分析了晚清时一位署名为“自由花”的译者所“翻译”的《自由结婚》[9]。由此可见,描述翻译研究对“翻译”这一概念的扩展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使历史上长期被忽视的翻译现象得到了应有的研究地位。

其次,描述翻译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现象。描述性的翻译研究不再像以前规范性的翻译研究那样将视野局限于静态、封闭的文本体系,而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探索翻译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翻译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现象。这样,为了更为系统全面地研究翻译,就应该采取“还原语境”(contextualization)的方法,即将其放回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研究与这一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多种翻译现象做出解释。这一点对我们评价以前的翻译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如傅东华所翻译的《飘》是许多提倡异化翻译的学者所批评的对象。有的学者断言,归化是“翻译的歧路”[10],所举的例子就是傅译的《飘》。但在分析时却没有对傅氏采取归化译法的原因作深入的探讨,更没有注意到傅氏早期翻译作品中也有很多极端异化翻译的例子,因此对傅氏的批评似乎有欠公允。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有的学者拿傅译的《飘》与李野光等人的译本相比较,“对影响傅东华先生翻译《飘》的几个宏观文化因素”进行比较,认为“应用历史的眼光去衡量一部作品的得与失”[11]。由此可见,描述翻译研究可对翻译现象做出历史的解释,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其成因。

再次,描述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地位,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有史以来,翻译活动在各文化中大多处于边缘地位,往往被认为是简单机械的语码转换,是一种次要的、派生的活动,翻译研究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翻译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翻译研究不具备独立学科的价值,只是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之

下的一个分支而已。描述翻译研究努力纠正这一偏见,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下,通过一系列实际的个案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表明翻译对于社会、文化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对于目的语社会、文化和文学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纠正了人们对翻译的偏见。同时,他们的研究也使人们看到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描述翻译研究尽力使翻译研究客观化,使其呈现出一般实证学科的特点,强调描述研究对于实证学科的重要性。图里就认为,“一门实证学科如果没有一个描述性的分支就不能称作是完整的、(相对)独立的”[7](1页)。韦努蒂指出,图里等人之所以提倡描述翻译研究,其基本动因就是要使翻译研究学科化,使之在研究机构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12](28页)。这种非常符合科学学原理的做法,对于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三 描述翻译研究的不足

尽管描述翻译研究有着种种优点,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就其现状来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是我们在提倡描述翻译研究时不能忽略的。总体而言,描述翻译研究的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强调研究者的客观中立,过于避免价值判断。描述翻译研究主张研究者应该保持客观、中立,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图里显然认为对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是可以做到中立的。他通过使用大量的科学术语力图表现出一副客观的样子。德拉巴斯提特(D. Delabastita)及德哈尔斯特(L. D' hulst)在论文集 *European Shakespeares* 中则再三强调翻译研究者需要保持“超然的、纯描述性的态度”,“中立观察者最大程度上的超然立场”[5](36页)。这种要求遭到了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与描述翻译研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质疑。如弗美尔(H. J. Vermeer)就认为,图里初期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超规定性的”(meta-prescriptive),因为他为翻译的分析设置了前提条件[13](49页)。韦努蒂(L. Venuti)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14](312页)。他指出,仅仅是将翻译作为文化史或是文化批评的研究课题这一举措,就已经是对翻译在当前文化等级制度中边缘地位的一种反抗;而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课题的选择总是会与当前的文化需求有关。斯内尔-霍恩比也曾对图

里坚持的中立客观的立场提出过婉转的批评,认为翻译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15](25页)。这些学者的批评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既然描述翻译研究的提倡者们坚信,翻译是多种因素共同制约的过程与产物,译者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力量的“操纵”,无法超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外,凭什么认为研究者就可以超然于各种影响因素之外,而做到完全客观中立呢?说到底,他们的这种立场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研究中并不可行。

描述翻译研究阵营的学者们所做的研究的确也证明了这一点。图里分析过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希伯来语译本。原诗是莎士比亚写给一个男青年的,但在译诗中,诗的接受者却变成了女性。对此,图里解释说,该译本是在20世纪初时写给信教的犹太人看的,而对他们来说,“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简直是越轨”[7](118页)。韦努蒂就此分析道,既然图里将这种同性关系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这就说明他对同性恋并非深恶痛绝,甚或可能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内[12](28—29页)。也就是说,图里根本没有做到客观中立,仍然流露了自己的立场。

二是脱离翻译实践,过度提倡将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描述翻译研究虽然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翻译活动本身,甚至混淆了翻译与其他文化活动的界线,长远来看必然会对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描述翻译研究进入形成与壮大期以后,主要得益于一些有比较文学背景的学者的大力提倡。这些学者关注翻译作品或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对原/译文转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则不太在意,他们所从事的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往往有些雷同,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他们的研究中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如勒菲弗尔就把翻译看作是“改写”,与文集汇编,甚至文学批评一样,都是翻译学者所应研究的对象[16](2—3页)。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地位,但在某种程度却是以冷落翻译活动本身为代价的,还会使人产生翻译研究从属于比较文学的错觉。尽管后来巴斯奈特试图颠倒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宣称应将比较文学看作是翻译研究的分支[17](11页)。但她的这种观点并未得到普遍响应,国内有学者还认为“不免失之偏颇”[18](54页),而且仍然没有廓清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描述

翻译研究强调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学者重视文化胜过翻译,因此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也日渐模糊。90年代以来,这一点尤其明显,使得翻译研究具有了文学理论中“大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中的大文化批评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19](4—5页)。描述翻译研究的滥用,又何尝不会造成我们翻译判断力的丧失,以及对译文及翻译活动本身的遗忘?

另一方面,描述翻译研究对于人们认识具体译作的优劣并无帮助,过度提倡必将不利于总体翻译质量的提高,甚至对翻译实践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先来看赫尔曼斯提到的一个例子。美国译者洛-波特(H. Lowe-Porter)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 Mann)的许多作品,译作行文流畅,大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但是,巴克(T. Buck)及卢克(D. Luke)对洛-波特的译本提出批评,指出其中误译甚多。韦努蒂针对他们的批评提出了批评,认为现今翻译“准确”的标准已经跟过去不同了,翻译中经常包含着译者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而进行的再诠释。然而,巴克和卢克做出回击,举出大量例子证明洛-波特译文中的错误与再诠释无关,只不过表明了译者的德语水平不高,而且未能正确地使用词典。这场争论最终还是以巴克和卢克的胜利而告终[5](1—3页)。这个例子表明,译文的确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过度关注于与翻译有关的译入语文化因素的讨论,不对译文质量作应有的评判,极有可能引起误导,纵容糟糕的翻译,从而导致整体翻译质量的下滑。这一点,目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由于我们尚未走出季羨林先生所忧心的“翻译的危机”[20],糟糕的、不负责任的翻译时有发生,理论界对描述的研究方法如果使用过头,极有可能加剧这种危机,不利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更不利于翻译及翻译学科地位的提高。

三是对译者的创造性不够重视。描述翻译研究属于外部研究,对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关注较少,而且多将译者置于被动的地位,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如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提出,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影响到它的行为模式。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目的语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在一种年轻的或正在形成的文学中;二是在一种边缘的或弱

势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中;三是在一种处在危机或转折点的文学中。此时,译文往往是译入语文学革新的源泉,会从原文引入本国文学中所没有的特色(包括原则和成分),如(诗性的)语言、写作形式和技巧等,也就是倾向于异化。而当翻译文学处在一种强势文学系统里,处于边缘位置时,译文则会“模仿译入语文学中主导类型业已确立的传统规范”,甚至死守原创文学已经放弃的旧规范,成为主要的保守因素,也就是倾向于归化[21]。译者的能动性在这里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了。再比如,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作一种“重写”,并列出了目的语社会中控制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后两者都是外在于译者的社会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自身的,但也有可能是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会对翻译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16](15页),“意识形态”和“诗学”则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16](48页)。在这里,译者也成了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被动的接受者,完全没有了自已的创造性。由此可见,在描述翻译研究那里,译者往往只是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借以操纵翻译的媒介而已,其自身的创造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文化因素的制约,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本

人。事实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是其固有的本质的属性,“在文学翻译这一特殊的艺术创造过程中,译家处于中心的、最积极最能动的位置”[22]。对译者创造性的忽视必然使描述性翻译研究有大而化之的倾向,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软肋。

尽管我国目前需要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有人甚至认为,描述翻译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我们的翻译研究无法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3]。但对于这一舶来的研究范式,我们还应保持足够的警觉,在充分了解其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取得的成就和不足要有清醒的认识,领会这一来自西方的译论“对中国译论研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其所具有的局限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其展开“批判性反思研究”[23],就该范式的特点及中国译学发展的状况来看,描述翻译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优点,的确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译界重点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要看到其潜在的不足,避免盲从与片面接受。实际上,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描述翻译研究与规范性的翻译研究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4]。

参考文献:

- [1] 李红满. 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J]. 外语与翻译, 2002, (2).
- [2] 张南峰. 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J]. 外国语, 1998, (3).
- [3] 张美芳. 翻译学的目标与结构[J]. 中国翻译, 2000, (2).
- [4] 林克难.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 中国翻译, 2001, (6).
- [5]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 [6] Robinson, Douglas.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7]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8] 樽本照雄.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A]. 王宏志.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9] 胡翠娥. 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J]. 中国比较文学, 2003, (3).
- [10] 刘英凯. 归化——翻译的歧路[J]. 现代外语, 1987, (2).
- [11] 冯庆华, 王昱. 从文化交流的宏观角度研究翻译——《飘》的译本研究[J]. 外国语, 1998, (3).
- [12]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 [13] Vermeer, Hans J.. *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Heidelberg: TEXTcon-Verlag, 1996.
- [14]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5] 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lishing Company, 1988.

- [1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17]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3.
- [18]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 [19] 曹文轩. 小说门[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20] 季羨林. 翻译的危机[J]. 语文建设,1998,(10).
- [21]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1990, 11(1).
- [22] 杨武能. 尴尬与自如 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初探[J]. 中国翻译,1993,(2).
- [23] 杨平. 对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思考[J]. 中国翻译,2003,(1).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ited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HAN Zi-man, LIU Fang

(English Department, Luoya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Luoyang, Henan 471003, China)

Abstract: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examine both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against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arget-culture, and greatly extend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Such an approach widens the sc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romotes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in a culture, and plays a major role in tur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Yet its shortcomings are far from negligible. Its advocates’ insistence on the researcher’s objectiveness and neutrality, and their reluctanc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s, if dogmatically stuck to, are serious drawbacks, especially in discussing translations in China now. Besides, the approach also shows a tendency to break away from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proper, and neglect the translator and his/her creativity.

Key word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chievements; shortcomings

[责任编辑:张思武]